

河北省精品课程教材

Zhongguo Wenhua Gailun

中国文化概论

◎ 主编 武占江

河北教育出版社

河北省精品课程教材

Zhongguo Wenhua Gailun

中国文化概论

◎ 主编 武占江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文化概论 / 武占江主编.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434-6176-5

I. 中… II. 武… III. 文化史—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6695 号

书 名 中国文化概论

主 编 武占江

策 划 邓子平 杨 才

责任编辑 刘相美 张 静 张 辉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 <http://www.hbep.com>)

印 制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

排 版 保定市万方数据处理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49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6176-5

定 价 23.50 元

版权所有, 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 违者必究。

总 序

精品课程建设是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国内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加强精品课程建设是全面推进教育创新和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深化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1〕4号)和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加强高等学校课程建设与评估的通知》(冀教高〔2002〕6号)精神,进一步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河北经贸大学以精品课程建设为龙头,以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全面推进课程建设工作,目前,已有27门课程建成河北省精品课程。

河北经贸大学是河北省重点建设的一所骨干大学,以经济学、管理学、法学为主,兼有文学、理学和工学的多科型财经类院校。在大力发展研究生教育、提高办学层次的同时,学校确立了以本科教学为主,以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办学思路。2005年河北经贸大学在国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获得优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打造精品课程是实施人才培养战略的手段。为了进一步推进精品课程建设,使精品课真正成为“具有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学内容、一流教学方法、一流教材、一流教学管理”的示范性课程,河北经贸大学于2005年启动了“河北省精品课程教材”建设工程。经过严格的考核和论证,《商品流通过学》等12门省级精品课程被确定为精品课教材建设重点项目。

高质量的教材出自完善的制度保障和高水平的作者队伍。河北经贸大学在推动河北省精品课程教材的编写与出版上,重点强化了三个方面:

首先是组织严格。本套精品课教材的编写和出版,由河北经贸大学教务处统一组织,实行专家论证、主编负责、名师编书等制度,从制度上规范了教材的编写工作。对作者提出了明确统一的要求,聘请教学经验丰富、学术造诣深、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教授担任主编,挑选学历层次高、教学效果好的中青年骨干教师参编,从作者队伍构建上保证了教材的编写水平。

其次是高质量要求。本套精品课教材的编写采取了企业经营中名牌战略的思路,以精品为原则,对教材的质量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河北经贸大学与出版社共同确立了教材的高质量目标,采取了主编负责,作者资格认定、学校拨付专款用于调研、出版社支付稿酬等措施,以制度为导向确保教材的高质量。

再次是教学的适用性。这套教材的编写坚持了教学适用性原则,比较好地处理了教材编写繁与简的关系,根据课堂教学基本规律,恰当地把握了教材的容量;比较好地处

理了学科前沿与教材内容的关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既注意了教材内容的成熟性、系统性和规范性，又体现了与时俱进原则，尽可能多地吸纳各学科科学研究新成果。

教材建设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期待着河北经贸大学通过“河北省精品课程教材”建设工程，精心打造精品课，开发出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

王凤鸣

2006年2月22日

目 录

第一章 农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发生	(1)
第一节 农业与中国文化的产生	(1)
第二节 农业文明与前诸子观念系统	(10)
第二章 中国古代经济结构与社会周期性治乱	(23)
第一节 中国古代经济结构	(23)
第二节 中国小农经济的形态与特点	(27)
第三节 中国农业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与社会的周期性动乱	(31)
第四节 商品经济与城市	(32)
第五节 中国封建经济的顽强生命力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命运	(34)
第六节 中国封建经济的特点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36)
第三章 百家争鸣与中国文化的再奠基	(39)
第一节 百家争鸣的兴起	(39)
第二节 百家争鸣与中国古代文化格局的基本奠定	(50)
第四章 儒家与中国主体文化面貌的形成	(68)
第一节 孔子与儒学的创立及发展	(68)
第二节 儒学的基本特点	(74)
第三节 儒学的文化贡献与历史影响	(81)
第五章 道家与道教	(88)
第一节 老庄思想与道家的产生	(88)
第二节 道教源流	(98)
第三节 道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07)
第六章 佛教与中国文化	(115)
第一节 佛教的基本教义及其东传	(115)
第二节 禅宗的基本理论及其文化内蕴	(120)
第三节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127)
第七章 中国的文学与艺术	(133)
第一节 中国文学的特质	(133)
第二节 中国艺术的精神	(145)
第八章 历史编纂学的发达与中国文化的延续	(153)
第一节 史学的重要地位	(153)

第二节	史学的发展历程与时代特点·····	(156)
第三节	史学的巨大成就·····	(158)
第四节	史学与中国文化·····	(165)
第九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170)
第一节	中国古代科技取得的卓绝成就·····	(170)
第二节	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以及近代命运·····	(182)
第十章	多元一体——民族的发展历程·····	(191)
第一节	古史传说和华夏族的形成·····	(191)
第二节	汉民族族称的出现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	(200)
第三节	宋元及以后的民族融合·····	(207)
第十一章	中国文化的近代转型·····	(213)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213)
第二节	对西方物质文明的接受及其与传统文化观念的冲突·····	(214)
第三节	“民”的发现、近代民权的张扬与中国近代文化的艰难转型·····	(226)
后记	·····	(238)

第一章 农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发生

世界任何早期文明都离不开农业的哺育，农业在早期文明的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地理环境以及政治、军事等各种必然、偶然的因素，农业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影响非常突出，从国家的形成、政权的组织形式到各种观念以及深层的思维方式等，都与农业生产方式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中华文明形成了与世界其他文明迥然不同的特点。从文化起源的角度来看，把中华文明称为农业文明是一点儿也不过分的。

第一节 农业与中国文化的产生

一 中国早期文明的分布及地域特征

有了人才有所谓的文化。华夏大地是人类的摇篮之一，在我国，有 29 个省市发现了人类的遗迹。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接近人类的类人猿是印度旁遮普省的拉马古猿，距今约 1500 万年~1000 万年。在我国云南禄丰也发现了类似的类人猿化石，距今约七八百万年，而且云南禄丰还发现了目前中国境内最早的猿人活动遗迹和人类化石（两颗人牙化石）。云南所发现的猿人就是著名的元谋人，距今有 175 万年的历史。禄丰属长江流域，在黄河流域的山西西侯渡、河北阳原的泥河湾也分别发现了早期人类活动的遗迹，西侯渡遗址距今约 180 万年，泥河湾遗址距今约 200 万年。虽然这两处遗址均没有发现人类的化石，但是这些人类活动的遗迹已经足以构成对人类起源于东非^①的挑战，起码说明亚洲（包括中国）与非洲一样，也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中国不仅有较早的人类遗存和化石，而且各个原始文化遗址前后相续，体现了明显的继承关系。接续元谋人的是陕西蓝田人（距今 100 万年^②）和北京人（距今 71 万年~23 万年），之后，直到新石器时期以及国家产生的前夜，各个时间段的人类遗迹、化石都有发现，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系列。在各种人类遗址中，北京人的影响最大。从 1929 年到 1937 年，共发现了 6 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还有其他非常丰富的文化

^① 东非的能人，距今 200 万年以上，在埃塞俄比亚阿发尔地区发现的石器距今有 260 万年。

^② 蓝田人有公王岭与陈家窝两个类型，其年代据古地磁测定分别为 98 万年和 53 万年或者 110 万年~115 万年和 65 万年。据吴汝康：《陕西蓝田发现的猿人头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人类》，1966 年第 1 期。

遗存。这些珍贵的考古资料说明中国文化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著名人类学家魏敦瑞(F. weidenreich)在仔细研究了北京猿人的化石后指出,北京猿人的体质特征至少有12项与蒙古人种有联系,铲形门齿就是最突出的一项。^①“上述这些在现代蒙古人种中出现率特高的性状,在中国发现的直立人到晚期智人中都经常出现。显示他们与黄种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亲缘上的继承关系。”^②包括北京人在内的各种史前文明显示,中华大地上出现过从拉马古猿到直立人(元谋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的各种形态,我们很可能就是这些原始人的直接后代。

人类产生之后,也就产生了文化。由于不同的自然环境以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原始人产生之后,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类型。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把中国的史前文明划分为六大区系,分别是:陕西、河南山西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和邻省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以长江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其中,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对后来的中国历史影响最大。此外,四川盆地的古文化也显示出了独有的魅力。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与后来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联系最紧密、最直接的是黄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原地区的文明。

二 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与中原文化

黄河流域之所以能够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重要角色,与它的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中国幅员辽阔,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地形地貌变化很大,经度、纬度跨度也都比较大。我国北边是辽阔的内蒙古高原,该地区属于温带,降水稀少,气温比较低。东北地区森林遍布,气候严寒。西北地区是崇山峻岭与戈壁沙漠,大部分属于干旱地区。青藏高原气候条件恶劣,自然环境严酷。西南的横断山区地势起伏很大,易于人类居住的地方多被重山包围、分割,难以形成大的文化集团。四川盆地沃野千里,但也是处于群山包围之中,与外界交流不便,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单元。比较适合早期人类居住、发展的是阳关、玉门关以及横断山脉以东的平原、丘陵地带,在这个地区,自南而北又可以分为三个单元:第一单元是南岭以南,包括台湾、福建南部,广东、广西南部,海南岛以及南海诸岛,属于热带气候,气候温暖湿润,全年适于作物生长;第二单元是南岭以北到秦岭淮河一线,主要是长江流域,属于亚热带气候,雨热条件好,四季分明,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第三单元为秦岭、淮河以北至长城以南地区,主要是黄河流域,属于暖温带气候,年降水量在400毫米~800毫米之间,为半干旱地区,是旱地作物的主要生长区。

第一、第二单元的雨热条件都比第三单元好,具有优越的物质、能量条件。但是,在文明的发展速度与程度方面却不如第三单元,这与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第一、第二单元由于自然条件良好,森林、植被茂密,但对于主要使用木石工具的先民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页。

② 吴汝康:《古人类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206页。

来说,不易开发,难以形成大的文明集团;其次,由于该地区生长条件好,可以依赖天然食物生活,人们改造大自然的迫切性就降低了,而文明正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司马迁曾经描述过这种现象:“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沓廛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① 所以,热带地区尽管很早就有人类居住,但是由于开发难度大,食物也易于获取,其文明发展缓慢,程度也不是很高。至于雨热条件较差的寒冷、干旱地带,由于自然条件严酷,也不适于人类文明的发展。所以,在世界范围内,文明发达较早的地区多是自然条件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的温带地区,黄河流域正好符合这一条件。

黄河中下游地区属于半干旱地区,受季风的影响,降水量不稳定,境内的河流往往会造成洪涝灾害,自然食物不如长江流域丰富;随着人口的增长,生存压力逐渐增加,他们必须改造自然,以维系自身的发展。除了这些不利因素之外,黄河流域还有许多有利于人类居住、发展的条件。首先,植被没有长江流域茂密,易于开垦;其次,河湖纵横,便于取水以及开展农业生产,目前发现的人类早期遗址多在河流的二级台地上。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黄土高原以其特殊的性质,哺育了黄河流域的早期先民。黄土高原横亘于黄河中游,面积广大,其最厚处超过100米。黄土高原是经过长时间的风力作用逐渐堆积而成的,由于所堆积的都是地表土,有着丰富的适于作物生长的无机盐与矿物质;黄土颗粒很细,上下缝隙很小,由此形成的毛细吸力可以把最深层的水分和养料吸收上来,供作物生长。这样就可以抵御因季风的变化而带来的干旱,在施肥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可以连续耕作而不必休耕,因此黄土具备了良好的使早期人类定居的条件。凿井技术发明后,远离河湖的定居就成为可能。考古发现,在龙山文化时期就发明了凿井的技术,陕西半坡的先民也掌握了凿井的技术,这就为农业文明的发展与发达提供了客观条件。在早期传说中,最擅长农业耕种的部族就是生活在黄土分布区的周部族,他们的祖先“弃”被称为“后稷”,是农业之神。著名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通过对比研究发现,半坡人村落的密度远远超过了当时两河流域居民点的密度,为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定居使原始人改变了游牧与游耕的生产方式,便于文明的积累与发展,这就使黄土高原地区的原始文明迅速发展起来,该地区也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的中心之一。

黄河流域分布着广泛的旧石器时期与新石器时期的原始文化遗存,尤其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能够直接和传说中的上古历史相结合。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文化有前期仰韶文化、后期仰韶文化以及龙山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又分为两个时期,即半坡文化(因陕西西安的半坡类型最为典型而得名)与庙底沟文化(因河南陕县的庙底沟类型比较突出而得名)。半坡文化的分布地区是以渭河流域为中心,东起太行山西侧及郑州左近,西止渭河之源,南至武当山北侧,北达河套及熊耳山地带;庙底沟文化的分布地区较前者向东推进了,至少达到太行山东麓。后期仰韶文化是前期的发展,吸收了大汶口文化以及

^① 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南方屈家岭的一些因素。至于龙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在社会组织形态方面,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中国最早的城市遗存就出现在龙山文化中,如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河南登封王城岗等地,城市的出现,说明人类已经迈进了文明时期。黄河流域的文化遗存与许多文化遗址直接和夏、商、周各部族有着直接的联系,成为当时中国文明最发达的地区。

三 早期农业文明与国家的产生

(一) 两个农业起源中心

“在全世界少数几个农业起源中心中,中国独居其二”。^①这两个农业中心分别是长江流域农业区与黄河流域农业区。在长江中游发现的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5000年的城背溪和彭头山遗址中发现了稻谷遗存,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也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有关早期稻作农业的实物资料。在河姆渡第四层的居住区内(约公元前5000年左右),发现大量炭化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的堆积,厚约0.2米~0.5米,最厚的地方超过1米,有的地方还发现了米粒。经过换算,这些稻谷的总量在当时达120吨以上。此外,在大约与河姆渡同期的杭嘉湖平原的桐乡罗家角也发现了大量的稻谷遗存。经专家鉴定,河姆渡的稻谷属于栽培稻的籼亚种晚稻型水稻,是迄今发现的我国较早的人工栽培稻。罗家角的稻谷除籼稻外,还有粳稻^②。这些考古资料充分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谷的起源地之一,它早于印度恒河流域和东南亚山地发现的稻谷遗存。稻米有两个亚种,一种是籼稻(又称印度稻),一种是粳稻(又称日本稻),粳稻起源于中国,后从中国传到日本,所以学者呼吁粳稻应该改称“中国稻”,而不是“日本稻”。究竟人工稻什么时候在中国产生,目前的考古资料还不能回答,因为在中国所发现的这些稻谷实物已经远离祖本而具有充分发展的形态,但是早于公元前7000年是没有问题的。

除稻谷之外,南方的先民还有许多食物来源,有多种植物,也有动物。河姆渡时期的家畜有猪、狗、水牛和鸡,羊是从北方引进的。

长江流域属于水田农业经济文化区,黄河流域则属于旱地农业经济文化区。农业是新石器时期的产物。公元前6500年~公元前5000年,中国就出现了粟、黍等作物。在河北邯郸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公元前5800年),发现了80个具有腐朽粮食堆积的灰坑,这类灰坑多作为窖藏粮食之用,较早的粟(即谷子,去皮后称小米)就是在这里发现的。在河南新郑裴李岗(年代稍早于磁山)和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了炭化的黍(一种黏米,去皮后称黄米)。在磁山和裴李岗还发现了不少加工这些粮食的石磨盘与石磨棒,另有许多其他农具。此后,在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遗址中,粟更是大量地被发现。如山东胶县三里河大汶口晚期窖穴中堆积的粟的朽灰,折合成新鲜小米约有2000千克,这都说明了中国是粟、黍等旱地作物起源的核心地区。粟与黍长期作为黄河流域古代居民的主要食物,是传统“五谷”(一作稻、黍、稷、麦、菽,一作麻、黍、稷、麦、菽)

①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二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5页。

② 浙江省博物馆自然组:《河姆渡遗址动植物的鉴定研究》,《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的重要组成部分。除粟、黍以外，黄河流域还发现了大量的大豆、油菜、芥菜、白菜等种子的遗存。磁山还出现了鸡的标本，这种鸡已经摆脱了原鸡的形态，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家鸡。此外，所饲养的家畜还有猪、狗、黄牛、山羊、绵羊等，传统的六畜中除了马没有确证之外，都已经具备。

（二）农业与国家的产生

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城市的出现，规模巨大的城市工程是社会分工的标志，是一部分人奴役另一部分人的体现。城市是贵族、特权阶层的居住地，另外一些为他们服务的手工业者以及其他人士也居住在这里。所以，城市是阶级分化的表现，是农村、城市对立的开始，是公共权力存在的基础，但是早期的城市与后来的国家还是有区别的。像龙山文化所发现的许多城市遗址规模都不是很大，数目却很多，这些城市所控制的地方也是有限的，与后来夏、商、周这样的大王朝还不能相提并论。它们只能是在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基础上形成的地区性的小国家，也有学者称之为酋邦。无论是这些小的酋邦还是后来大的王朝，它们是怎样形成的，考古资料难以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文献资料。历史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国家的产生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其一为原来的氏族部落没有被解体，它们的组织形式以及财产所有制在经过稍微改造之后成为国家的组成部分；^① 在氏族、部落的基础上，通过斗争、联合而形成了国家，原来的氏族转化成为宗族，部落或者部落联盟组成诸侯国（或称方国、邦），以不同的方式或紧密或松散地服从于中央王朝。其二为农业生产，这是国家产生的直接推动力量。第一个特点已基本被学界所认可，其实第一个特点也是在第二个特点的基础上产生的，下面我们就对第二个特点略作叙述。

大量城市遗址的主人是谁，由于当时没有文字遗留，无法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那些在建立国家过程中的英雄人物则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斑斑史影。他们就是神话、传说中的各种半人半神的英雄，与我们主题有关的有三皇、五帝^② 以及共工、蚩尤乃至各部族的英雄、神圣的祖先。由于当时没有文字，他们的事迹被口耳相传，虽然多被神化，但也蕴含着历史的真实。

炎帝是三皇之一，在中华文化中享有崇高的地位，综合各种文献，我们发现他的突出贡献就在农业方面，他因此而被尊为农业之神，号“神农氏”。《周易·系辞》中称炎帝发明了耕作工具耒耜，将农业推广于天下；世传神农尝百草，对植物栽培以及中药研

^① 这一点是中国国家产生与西欧国家产生的重要区别所在，在这方面作了开拓性研究的是侯外庐先生，下面的一段话简洁而典型地描述了他的这一观点：“‘古典的古代’（笔者按：指西欧类型）就是从家族私产再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而‘亚细亚的古代’（笔者按：指中国）则是从家族到国家，国家混合在家族里面，就是所谓的‘社稷’。所以，前者是新陈代谢，新的冲破了旧的，是革命的路线；而后者却是新旧纠葛，旧的拖住了新的，是维新的路线。”参见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5页。

^② 传说中的“三皇”有不同的人物组合，如：燧人、伏羲、神农；伏羲、女媧、神农；伏羲、祝融、神农；伏羲、神农、共工；伏羲、神农、黄帝；黄帝、少皞、颛顼。其中，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被称为“三皇”的说法流传最广。无论三皇组合如何变化，神农多为其中之一，由此可见，神农在三皇系列中具有重要地位。传说中“五帝”的不同组合有：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少昊、颛顼、喾、尧、舜；帝喾、尧、舜、禹、汤；黄帝、少昊、颛顼、喾、尧。其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这种传说流传最广。

究作出了贡献。黄帝居五帝之首，一些重要的发明也都归之于黄帝及其大臣、后妃，如养蚕、缫丝、舟车以及生活用品酒、衣服，还有文字、甲子（历法），等等。总之，黄帝被描述为农业文明的集大成者。另外一个强大有力的部族首领就是触怒不周山、使天柱折断的共工氏。传说共工氏善于平治水土，其首领句龙因此特长而被奉为土神——“社”，称为后土^①。烈山氏部族一个叫“柱”的部族成员，因为善于耕稼而被奉为谷神——“稷”，烈山氏又被认为是炎帝的别名。周部族的祖先“弃”是种植庄稼的能手，他生活在尧舜时期，为当时主管农业的官——司徒。由于弃的突出贡献，后来他逐渐取代柱而成为谷神，被称为“后稷”，“后稷”就是“大帝稷”。大致来说，夏及其以前，柱为谷神，商以来就是弃了。除了土、谷二神外，在较早出现的神话传说中还有木神、金神、水神以及火神，木神为句芒、金神为蓐收、水神为玄冥（商部族的祖先之一）、火神为祝融。这些神以前都是主管谷以及金木水火土各项具体事务的官员，由于他们的突出贡献，死后分别被尊为神，永远享受着后代的供奉。^② 先秦文献往往把这些神灵或者部族的英雄都与五帝联系起来，而且传承世系斑斑可考。这些世系的真实性是否可靠以及是否可以找到一个可信的世系传承，在这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传说以及文献资料把中华民族的英雄通过三皇五帝进行了集中，而他们的英雄事迹又再次被集中在农业生产上面。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无疑是农业生产的重要因素，考古学现在还没有发现三代有金属农具，但是在属于夏代纪年范围的二里头文化中却发现了金属器物，金属器物是贵族生活尤其是祭祀中的重要器物。那些部族首领或部族成员在平治水土、种植五谷的过程中形成了崇高的威信，得到本部族以及其他部族的拥戴，成为英雄人物。五神也好，五官也好，他们的崇高地位都是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成就的。在这些传说中，我们看到的那些英雄都是服务于大众，进行着公共事业的管理。但是，在公共事业管理的过程中，也逐渐使权力集中，并有可能脱离具体的事务而固定化。我们进而可以这样认为，中国早期政权就是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产生和奠定的。

除上面所提到的内容外，大禹治水的传说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记忆中流传最久远、影响最大的神话。中国属于季风气候区，降水很不稳定，再加上地形地势的原因，使黄河很容易泛滥成灾。对于居住在沿河流域的居民来说，治水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中国关于治水的传说也非常多，上面所说的共工、鲧以及大禹都是治水的英雄。此外，还有商的祖先玄冥等。要对黄河这样的大河进行治理，必须将沿河的相关人员与部族联合起来进行系统协作，否则，对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可能就是灾难，所谓“以邻为壑”就是在治水过程中没有进行良性协调而带来的消极后果。河

① 参见《礼记·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之以为社。”“其子”二字，未必就是某人的儿子，有的学者把它解释为部族首领，也是一说。我们认为，这里不必拘泥，只要把它理解为某个部族的有突出贡献的部族成员就可以了。

② 参见《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

流沿岸的居民在共同对抗洪水过程中，各个部落以及部落联盟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大的工作共同体，远远超过了平时的生产、生活群体。由于实际事务的需要，就产生了超越平时部落或部落联盟范围的统一的权力，像共工、大禹那样在统一指挥中具有强大力量和专长的部落、家族乃至个人逐渐取得了权力上的优势。这种权力一开始是临时的、纯事务性的，只是为了对付水患。但是，由于工程的浩大以及延续，这种权力逐渐被集中并且固化到某个或某几个家族当中，公共事务消失后，权力却延续了下来。反映在传说中就是鲧、禹在治水领导权上的继承，使姒姓涂山氏（禹所在的家族）逐渐取得了优势和控制大范围民众的实力。到了启的时候，终于破坏了带有原始民主性的禅让制，形成了王位世袭的中央王朝。当然，在公共事务上的贡献仅仅是建立大规模国家的基础，要实现权力家族化、家庭化的传承必须以武力为后盾。这样，武力征伐的事情就成为三皇五帝时期的常态，各种相关文献更是俯拾即是，这种战争也不乏残酷性，比如“流血漂杵”等等说法就是对当时战争残酷性的形象描述。禹与启之所以最终取得成功，是因为他们把服务大众与武力征伐比较好地结合起来而已，这样就逐渐完成了由部落联盟到国家的过渡。大禹就是中国国家产生时期的关键人物，也成为国家统一的象征。后来大禹治水的事迹被大大地扩大，除了具有神力能够开辟三门峡、三峡这样的大峡谷之外，中国的山川形势也被认为是由大禹斧凿而成；他的足迹遍及神州，中国九州之类的地理单元也被认为是由大禹所划定的。其实这正反映了大禹在建立大规模中央王朝过程中的奠基作用。

在大规模的协作劳动中，需要的是人力的积聚以及部落的外在联合，这时我们看不到商业力量解体氏族、部落的情形，只有因农业生产的迫切性而导致的氏族与部落的联合；原有的血缘组织被保留下来，成为新的王朝的基础（在国家产生之后，氏族经过稍微改造而被称为宗族），成为新的国家的基本单位。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协作，犹如军事行动，需要集中指挥，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国家依照这种惯性力量也必然是专制的。

国家不是凭空产生的，也没有独立发展的权力，它们必然是人在与外界斗争（劳动）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必然的、偶然的事件而产生的。大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之所以都形成了专制的类型，与大规模的生产协作需要统一指挥有着直接的联系。

（三）农业文明类型的奠基

说中国文明是农业文明并不意味着中国商业、手工业以及海洋事业的不存在和不发达。传说神农时期就有了市场^①，而且由于中国幅员辽阔以及气候、地形的多样性，导致了物产的多样性，为交换提供了必要和基础。同时，大一统的王朝又使这种交换成为可能，且中国也不缺能工巧匠，手工业技术也很发达。中国东部濒临浩瀚的太平洋，海岸线曲折，沿海地区像浙江、福建乃至山东等地，都有着良好的航海条件，与希腊、法国、意大利相比也不为下；东北部与日本、朝鲜一衣带水，东南与台湾省以及东南亚各岛屿都可以舟楫相通。而且，中国古代航海实践以及航海技术之发达举世公认，无需置辩。事实上，沿海地区一向富渔盐之利，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以之富甲天下，傲视诸

^① 参见《周易·系辞下》：“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侯。客观地说,中国要形成一个像希腊那样的海洋国家的外在条件是存在的,但最终没有形成事实。海洋因素在中国早期国家中不占有重要地位,这并不是什么历史的宿命,需要从具体的历史境域中去寻找答案。

地理条件是文明形成的必要条件,但地理条件并不是决定文明走向的唯一因素,希腊之所以形成海洋、商业型文明也是由其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我们先来看中国。中国沿海地区多为丘陵,与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开阔平原联成一体,东南沿海也在珠江三角洲平原的怀抱之中,这些地区与内陆没有难以逾越的地理屏障。在沿海岛屿上形成的文明必然是分散的、弱小的,在总体力量上难以与长江、黄河流域大的文明体相抗衡。在两个大河流域文明形成之后,它就产生了巨大的向心力,以其强势向沿海扩张,沿海地区小的方国纷纷臣服于大陆的农业文明政权。沿海的海洋性因素逐渐被大陆性因素所吸收,而难以彰显其个性。文明一旦形成,就具有了很大的惯性力量,或者说是惰性力量,历代统治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到内陆,都看到了内陆所开发出来的巨大财富,而无暇东顾向海洋回眸,夏、商、周三代都向中原争夺权力,即使是产生于东方的商文明也是向西发展,而不是向东。经过三代的经营,大陆文明牢牢占据了主导地位,逐鹿中原成为强大的历史惯性,这种惯性力量是极其坚固的,它使权力中心以及经济中心长久地缠绵于黄河流域。其实,长江流域在财富方面比黄河流域要强(仅指农业而言),中国开始注意长江流域的富源是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发生的。经过了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以及唐代的“安史之乱”,在五代、北宋时期,经济重心才转移到长江流域,而政治中心则仍然在北方。元明清时期北方的粮食已经难以供给政治中心北京的消费,但是历代王朝仍然通过海运、漕运等方式花费巨大的力量来维系北方政治中心。到了近代,由于强大的破坏性的冲击力量,中华文明才开始关注海洋。

所以,中国早期文明是农业文明,并不是说没有海洋文明形成的条件和因素,而是优先产生的农业文明把这种条件和因素忽略了。中国农业文明政权的象征为“社稷”,“社”、“稷”分别是“土神”和“谷神”,这就典型而形象地说明了农业文明的特征。

四 希腊文化与商业文明

希腊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个特例,它不仅仅是产生于航海与商业基础上的文明,而且在雅典等城邦还发展了高度的民主政治,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它的形成与发展和地理环境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早在公元前3000年,克里特岛以及希腊半岛南端的迈锡尼就出现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历史上称之为“爱琴文明”。该时期出现了城市和文字,但是由于天灾以及外族入侵,爱琴文明最终衰落,希腊文明后来在半岛以及周围的岛屿上再次发展。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端,爱琴海的北岸,爱琴海中的岛屿星罗棋布,总数达到480多个,非常便于航海;西边是小亚细亚,穿过土耳其海峡可以达到黑海北岸。希腊地区山脉纵横,盛产葡萄、无花果、橄榄以及铜、铁、大理石等,农业不发达,不少地方(像雅典)粮食不能自给,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通过航海贸易从外部(如黑海北岸)购买粮食,单从这一点来说,希腊人就必须依赖商业,商业成为希腊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因素。这一点在雅典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典型的

表现。

雅典城邦位于希腊半岛东部的阿提卡半岛，该地区曾经有多个部族生活，几经起落。在迈锡尼文明衰落之后梭伦改革之前，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雅典居民也是在血缘部族的社会组织下生活的。阿提卡半岛有4个部落，每个部落有3个胞族，每个胞族有30个氏族。这时，雅典已经出现了私有制和奴隶，土地已经分归个人所有，每一个氏族成员都有一小片份地；出现了氏族贵族，他们通过议事会控制着氏族、部落的大权，一般的氏族成员可以参加人民大会，享受着原始民主制的残余权力。由于航海以及贸易的发达，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为了偿还债务，许多人的份地被抵押出去，自己只能支配六分之一的收入，其余部分为债权人所有，这种抵押土地的人被称为“六一农”。然而这往往使他们失去土地，最后沦为债务奴隶，相应地也就失去了最后的政治权力，不能参加人民大会了。同时，由于频繁的贸易往来，越来越多的非氏族成员居住在雅典，但是他们和原住民没有血缘关系，在氏族政治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政治权力，不被看作是雅典的公民。这些商业“平民”与失去并离开原有土地的居民都是“外乡人”。在阿提卡，混居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乱了原来按血缘划分居民的原则。失去土地的居民为了免于被沦为奴隶进行着激烈的反抗，而那些外来的商业平民也要求得到政治权力，由于他们往往具有强大的财富，所以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雅典地区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危机。为了解决这种矛盾，雅典开始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从传说中的提秀斯改革到梭伦以及克里斯提尼改革，终于使雅典在和平的情况下解决了这些矛盾，并且最终形成了民主国家。

梭伦改革奠定了雅典民主制的基础。梭伦改革的第一个重大措施就是颁布《解负令》：即解除债务及由于负债而遭受的奴役，废除平民的债务，禁止债务奴隶，不允许把本地人当作奴隶，公民沦为债奴者一律解放。

第二项重大措施是按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大致来说，总收入能够折合500塔兰特（约合52公升）谷物的为第一等级，该等级的人可以担任任何官职，战时出骑兵，装备由自己提供；收入在300塔兰特谷物~500塔兰特谷物的为第二等级，担任一般官员，战时出重装步兵；收入在150塔兰特谷物~300塔兰特谷物的为第三等级，担任其他官职，战时出轻装步兵；收入在150塔兰特谷物以下的为第四等级，不担任官吏，战时充任海军。第四等级虽然被剥夺了担任官吏的权利，但是他们可以参加人民大会，具有发言权和选举权，一切官吏都由人民大会选出。这就在法律意义上保障了平民的最低权力，他们进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第三项措施是设立新的国家政权机构，限制贵族长老会议的权力。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4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等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还设立了陪审法庭，陪审法庭是由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任职，审案时通过投票作出判决。但主要的实权机构是四百人会议，原来以氏族贵族为主的贵族会议仍然存在，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荣誉机构，实权大大降低。

梭伦改革仍然保留了等级制度，更没有废除奴隶制，只不过是有一种等级制度取代另外一种等级制度而已。但是，它承认了外来人的公民权，并用法律保障他们不再沦为奴隶，这就打破了以前以血缘划分居民、分配政权的形式。虽然旧的贵族会议仍然存在，但是在地域财产基础上所建立的新的机构已经取得实权，一种新的国家形式诞生了。此后的克里斯提尼改革进一步废除了血缘地域的残余，完全以居住区划分居民，组织政权。

在希腊新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我们看到，商业始终是一种明显而突出的推动力量，它使外来人、平民摆脱了受奴役的地位，并且取得了公民权；旧的血缘氏族逐渐被解体，血缘组织原则逐渐退出政治舞台。

中国的国家形成始终是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进行的，如大规模的治水活动，氏族、部落的组织没有被打破，国家就是在大规模的部落联盟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大规模的农业活动无暇触及最基本的部落、氏族的内部结构，它们被保留了下来。商业在这里没有起到解体血缘氏族的作用，血缘组织原则变成了政治组织原则，不仅王位是靠血缘世袭，而且那些原来的氏族贵族演化成为了宗族，也世袭着各种官职，有的成为地方诸侯，有的辅佐新成立的王朝共主——王，当然也有各级臣服于诸侯的官职，他们都是血缘世袭的，也就是世卿世禄，即所谓的宗法制。在西周时期，这种宗法制达到最完备的形式，这是在政治制度方面区别于古希腊的根本所在。希腊民主制的形成除了与航海贸易有关之外，还与其岛国寡民的特殊地理环境有关，在当时传播手段不发达的情况下，彻底的民主制只有在小范围内才有操作的可能。而中国早期政权产生的地域极其辽阔，政权力量非常强大，即使有一些其他的政治因素，也被这种巨大的政治惯性所吞没，而难以显示其个性。

第二节 农业文明与前诸子观念系统

前诸子观念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产生之前的观念系统，是夏、商、周三代时期文明的积淀，是诸子百家兴起的文化土壤，它反映着更早的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化基因。诸子百家及其以后灿烂多姿的文化成果，都不同程度地保留甚至发展着这种“基因”。

一 尚德自强与早期人文主义

在我们祖先改造自然、发展农业、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在后代子孙中流传，这些事迹经过历代相传，被不断加工、凝练，形成了文化传统，积淀在每一个华夏子孙的血液之中，影响直到今日。“尚德自强”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地看，在中国文明发轫之初，还没有文字发现（目前为世所公认的中国最早文字仍然是甲骨文），当时的文化传统与各种观念难以找到直接的资料。但是，并不等于说一无痕迹可寻，神话传说就是民族记忆的曲折体现。黑格尔认为，神话蕴含着民族精神。现代学